

# 对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于光远的缅怀与铭记

——在“于光远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马惠娣

( 2023 年 10 月 1 日 )

于老曾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sup>1</sup>，这对我影响很深。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背景，因而浅薄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在我与于老近三十年的跟随中，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原来是一个充满人文思想的学说。

( 限于时间，在这里仅简单地介绍 )

休闲哲学，是于老在他的晚年开辟的新学科，从他对休闲哲学的阐释中，我理解了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信念如此之坚定！也理解了那么多声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如何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于老提出休闲哲学（当时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藐视了这一问题），因为他是系统完整全面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休闲哲学在中国的开创，凸显了于老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理解与汲取。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并贯穿一生。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读完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英文版），这对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信服……他说“马克

---

<sup>1</sup>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二十岁到现在快要八十岁了，这个科学信念我没有动摇过。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时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的确不理想，就在这个时候我宣称我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思主义给了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并成为我毕生的航标。”

于老的浪漫主义情怀也浸透在骨子里，1936年，他在广州学习当时苏联出版的《供说外国语工人使用的俄语读本》，看到苏联的公园改称为“文化休息公园”，他觉得标明这一点是有好处的。1939年，于光远开始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劳累的时候，他以翻译马克思写给燕妮的爱情诗作为消遣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他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回国后，以“旅游与文化”为题发表文章畅谈：“旅游是增进旅游者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且轻松而又愉快的一种活动。”

于光远深受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影响，关注现实的人、解放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积极推动“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三段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见证了从他青年时代起追求革命的动力和初心，八十年代初他在学界发起了生活方式研究的热潮。1995年5月我国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是年7月他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1996年发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的长文，指出：“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普遍有闲是全体国民进入从‘谋生手段’到‘乐生要素’的社会……本质上是如何让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其中孕育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说到底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乐的事，我

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没有理由忽视它。”他特别强调休闲哲学的实践性应体现在对时代气息、日常生活经验、价值理念的充分反思与理解上，关注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整体性与相容性，尤其要体现在塑造人的正确价值观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论普遍的有闲社会》、《吃喝玩：生活与经济》、《休闲·游戏·麻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休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等休闲研究著述。

晚年，他仍“坐轮椅走天下”，不遗余力地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了解疾苦，走向各种“现场”。不论是对重大社会问题，还是基层社区，他都从理论与方法上做出科学解释和实践指导。

他做学问的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坚持两种关切：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两种方法：“咬文嚼字”和“广征博引”；两种精神：“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为中国休闲研究题写的宗旨是：“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

于老，作为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之中；融合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兼备于学术情怀与社会关切；洞察于精微之处与高远之间；敏锐于生活咫尺与社会弘阔。他的思想是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后学永远的精神指南。

如今，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化，于光远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这道课题已经书写了充满温情而丰富多彩的答案，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提供了方向。

谨此缅怀与铭记！



( 2008 年 7 月 10 日陪于老去考察社区的路上 )



( 2009 年 8 月于老为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题字 )



( 于老最后一个生日是在病房中度过的，我带去一幅字：

“大壑空幽瘦松高洁

莽原宏阔碧水清扬”

挂在病房的墙壁上庆贺他的九十八岁生日。)